

社会学丛书

中国社会学史

杨雅彬 著

社会学丛书

中国社会学史

杨雅彬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社会学丛书
中国社会学史
杨雅彬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41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70

统一书号 3099·941

ISBN 7-209-00050-X

C·1 定价: 2.30元

出版说明

社会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这门学科对研究社会的活动规律、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迅速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把社会学列入社会科学需要研究的十二个项目之一。邓小平同志也说，对于社会学“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近几年来我国社会学界的同志写了不少探索的文章，出版了一些翻译著作，重印了一些解放前我国社会学家的有关著作，而广大读者更需要新编写的比较系统的社会学书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社会学丛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较系统地阐述和介绍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全套丛书有社会学总体理论方面的，也有分支社会学方面的，共十余册。

限于目前社会学的研究状况和我们的编辑水平，这套丛书可能不够全面、不够成熟，但是我们愿以它作为我国社会学发展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砖和垫脚石。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使之趋于完善。

前 言

路是人走出来的。人走过的路都会留下足迹。解放前数百名社会学者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五十年，他们留下了经验和教训，同时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精神产品。

对前人的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文化。对于解放前社会学者的精神产品，我们也要批判地继承。老社会学者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他们的某些理论和观点，对我们今天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此乃是笔者研究社会学史的动因。

解放前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很薄弱，解放后社会学研究又中断了三十年。因此，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虽不能说是一片处女地，但也算是一块需要开垦的荒地。笔者在同仁的鼓励和支持下冒昧试耕，初种的土地称之为生地，结出的果实是不成熟的，本书就是一颗不成熟的果实。但我相信今后经数人多次的艰辛耕种，这块园地必然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来。

本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背景，描绘社会学从多种渠道传入中国的情景及其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概貌；同时对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用各种观点研究社会学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主要著作、机

构组织及其主要活动等，作了系统的介绍，以求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学的研究水平，使读者对解放前的社会学研究有个初步的了解。

笔者探索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将重点放在挖掘对恢复以来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对现今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上，对重点部分加重笔墨，其它一带而过。

在每个历史发展时期，通过对其重要人物、代表著作、组织及事件的叙述，突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全书涉及到几十位社会学家，对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作了简介，并扼要地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对各个阶段的主要机构及活动也作了介绍，以便在社会学历史资料缺乏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对用各种不同观点研究社会学的社会学者，按其在中国社会学界所占的地位给以适当的篇幅，力求能较客观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学历史的本来面貌。

笔者既一般性地描述社会学从20世纪初传入我国止于1949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又着重叙述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研讨，从而显示出社会学的社会功能。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社会学的传入时期，着重阐述社会学的传入是以适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为主因，并介绍了社会学传入中国的途径。第二章社会学的传播时期，突出说明社会学的传播也是适应要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各派人物中对改造中国社会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作了介绍，并叙述了社会学传播的途径及如何建立社会学学科的经验。第三、四章着重介绍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和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所进行的种种研讨。第五章着重介绍了中国社会建设时期

的理论和实践。应当说，中国的社会学并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还有待于我们这一代及后来人进行开拓与创建。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吸收了孙本文等老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参阅了百余本社会学及有关的文、史、哲、经著作，拜访了吴泽霖、梁漱溟、李安宅、李景汉、雷洁琼、李剑华、张世文、杨堃、陈定閔、关瑞梧、张之毅、袁方、王康、张正东等十多位老社会学家，并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1985年5月写出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教材《中国社会学史稿》。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和调查研究，进行了若干次的修改，充实了部分有价值的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此书。

该书是在老社会学家和同仁的帮助、鼓励下撰写而成。我衷心地感谢这些老师和同仁，尤其是感谢王康、张之毅教授、许抗生副教授，同时感谢给我若干具体指导的编辑同志。

由于中国社会学史方面资料的搜集工作比较困难，有些材料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和挖掘；再者，笔者在四年中虽作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时间短促，对有些问题研究得还不深，有些问题还有待作进一步研究；又加本人的力量单薄和水平有限，因此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希望同仁及读者多多给予指教，并希望有关人士提供材料，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和深入研究。

作 者

1986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学的传入 (1919年以前)	1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	1
第二节 严复与社会学的传入	9
第三节 社会学间接从日本传入中国	25
第四节 早期社会学的移植	20
第二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 (1919—1927年)	39
第一节 北京社会实进会	39
第二节 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论战	45
第三节 社会学人才的培养与社会调查的开展	52
第四节 瞿秋白与社会学	59
第五节 社会学团体的出现与书刊的发行	72
第三章 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1927—1937年)	90
第一节 调查研究的兴起	90
第二节 普通社会学、社会进化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105
第三节 社会问题的研究	116
第四节 部门社会学及社会学方法的研究	128
第五节 中国社会学社及有所侧重的研究趋向	148
第六节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	160
第四章 30年代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173
第一节 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173

第二节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	177
第三节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186
第四节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195
第五节	发展都市救济乡村及中国要全盘西化说	203
第六节	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	217
第七节	陈翰笙的农村调查	224
第五章	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1937——1949年)	245
第一节	抗战期间西南社会学基地	246
第二节	乡政学院定番实验县	251
第三节	吴文藻倡导社区研究	257
第四节	社区研究的发展	264
第五节	少数民族地区调查	292
第六节	抗战期间解放区的农村调查	297
第七节	于光远的《调查研究》	306
第八节	孙本文与社会学中国化	317
第九节	社会学界的倾向	326
附：	主要参考书刊目录	339

第一章 社会学的传入

(1919年以前)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社会学的传入

一、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社会学传入中国，是与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相联系的。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英国打败，暴露了清帝国的腐败。自从1842年订立南京条约，中国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进入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於1851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帝国的失败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帝国主义掀起了对中国进行疯狂的割地和索取赔款的浪潮。自此中国人民不但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同时又加上了外来帝国主义的剥削。这种半殖民经济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数千年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开始瓦解。清政府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促迫下，更加重了对我国人民的封建剥削，在繁重的旧捐税上又加上新捐税，以填补对外的赔款和鸦片贸易的亏额。闭关自守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骤然变动，旧的财政、经济、政治、礼教等各种制度，愈益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的枷锁。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从1850年太平军起义到1873年陕甘地区回军的被消灭，在这二十余年中，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规模空前巨大。虽说人民起义前后被镇压下去，但都给了清政府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镇压过太平军的洋务运动派的地位却得到了提高。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再次战败，又一次出现帝国主义对中国割地的狂潮。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士以机会来反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从而在政治上产生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当时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就是这样一些代表人物。他们想走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图强的道路。他们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当时改良变法维新思潮，被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他们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梁启超的《时务报》受到启蒙。他们谈新书、学西学、积极参与变法维新，认为维新变法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康有为从1888年到1898年先后六次向皇帝上书，完整地提出了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方案。在经济上，要求保护和发展民营工商业的政策，大力推行机器生产，反对官办企业的垄断；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在军事上，主张迁都，选将，练兵，抗敌，反对投降主义；在文化上，要求废除科举，主张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1897年德

国强占胶洲湾，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光绪帝“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上书中列举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又请皇帝读《泰西新中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自著的《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考》。他在《日本变政考》书序中说，日本学习欧美，前后花了三十年时间获得成功，中国地广人多，如果就近学习日本，十年之内就能成为世界著称的强国。光绪帝迫于国内外的形势，接受了康梁等人的变法主张，于1898年6月下诏实行新政。但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绝不能允许中国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帝国主义通过洋务派与顽固派勾结起来，确立了强大的政治统治，任何改良必然遭到他们严厉的打击；再者，由于改良派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害怕人民革命，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因此戊戌变法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虽然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社会学传入了中国。

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与社会学的传入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虽对社会变革的认识有所不同，但在中国社会崩溃，国家危亡的时代，在阶级与民族矛盾深重的形势下，他们出自爱国之心不得不重新思考整个世界，为中国寻找出路而去探求真理。他们一面总结中国社会的历史，一面向西方学习。他们相信和坚持事物发展进化的观点，肯定自然和社会的进化发展，从而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是当时正在兴起而远未独立成熟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企图走改良主义的政治道路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而西方社会学的渐进说也正适应了他们改良主

义的需要。本节着重介绍康、梁、谭三人与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关系。

1. 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根据

向西方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的康有为，在他的思想中就融合了中西社会学说，并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他1884年开始编的《人类公理》一书（后改名为《大同书》）中，融合了中西社会学说。康有为提出的新“三世说”历史观，就是以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为其外壳，融合了礼运篇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说、卢梭天赋人权说、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说等而成的一种中西社会学说的混合体。同时他还吸收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进化的，历史的进化是由“据乱世”变为“升平世”，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他所说的“据乱世”是封建社会，“升平世”是资本主义社会，“太平世”（大同）是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处在“据乱世”，应当加以变革到“升平世”。他的社会进化观，从根本上打破了数千年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统治思想，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他只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因而他只承认“渐变”，而反对突变，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的变革。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构想出一个未来社会，即“大同之世”。他所描述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废除了家庭，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志愿结合的社会。他以个人为社会构成单位和基础的资本主义理论，来代替以家族为基础和单位的封建主义。康有为当时提出三世进化说与“大同”说，虽说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坚决反对社会阶级斗争和革命，幻想靠发挥人的

仁爱精神，靠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大同”，这实在是一种空想，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还比较有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理论，其中包括了重要的社会发展问题、民主制度问题、国家问题、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等等。

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理论，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治天下之道”（《说群自序》）。这里的“群”，即指人群、社会而言。他说群的目的在于保国保种，方法是提倡联合黄种，君民同治，以孔教为国教，反对专制独裁，反对外国侵略者及买办洋务派，变的目的是变政体，方法是废科举、开学校、改官制，实行地方自治。他对社会的存在与社会变革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他认为“群”是天下之公理，万物之公理，同样“变”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他明确指出“群学”，即“社会学”是贯通天人之际的根本学。他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虽说他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原则机械地套到社会上，但他所宣传的变法的理论和政纲，在戊戌以前对维新运动还是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的。在梁启超的文章中曾多次出现过“社会学”与“人群学”。梁启超在他著的《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格致学沿革考略》和《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三文中，就直接提“社会学”之名。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则将“人群学”与史学、政治学、生计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并列，并在该文中的“社会学”一词下，加注“人群学”。可见他说的“人群学”即是社会学。以上事例表明，梁启超是十分重视对西方社会学的研究的。这充分说明了社会学是适应社会

改良的需要而传入的。

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谭嗣同的社会思想里，也明显地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学说。谭嗣同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起来向封建的纲常名教挑战的启蒙思想家。他在自著的《仁学》中，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他从批判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出发，进一步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到进一步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纲常名教。谭嗣同在反封建的同时，竭力提倡自由、平等、博爱，鼓吹人道主义。他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总称之为“仁”，他把宣传变法维新的哲学著作叫“仁学”。而“仁学”实质上就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以此作为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行改良主义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仁学》成书于1896年，有二卷五十篇，1899年始刊于《清议报》。此书集中反映了谭嗣同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该著作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社会学说，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及佛教思想，熔成庞杂的思想体系。谭嗣同在《仁学》第一篇《仁学界说》中提到“社会学”（“社会学”的译名，最初采用的是日译法），《仁学》是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的。

《仁学》中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洲之书。”（《谭浏阳全集》第四册，《仁学》）谭嗣同在《仁学》里倡导仁学的理论，他认为要研究仁学必须精通社会学，说明他对社会学已有相当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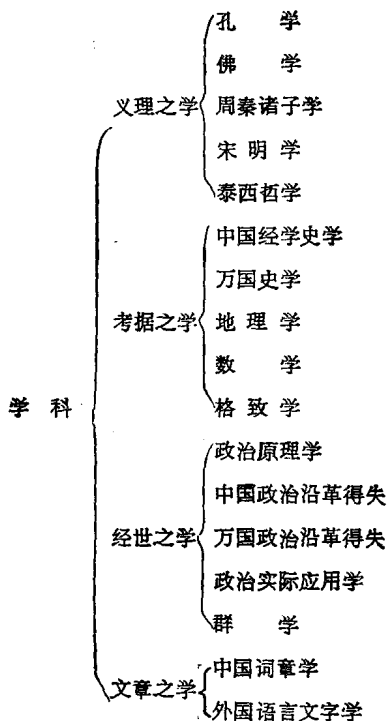
2. 为培养改革人才提供新思想

维新派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努力学习西方。他们认为要进行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改革，一方面必须培养大批的具有新思想的改革人才，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民智”，以便使改革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因此他们一面宣传变革思想，一面办学堂、建学会、办报馆，从事宣传与培养人才的活动。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要救亡图存、富民强国，就一定要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维新派认为，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是为了废除科举、改革官制，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

康有为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号为长兴学舍）开始聚徒讲学。康有为自任总教官、总监督，著《长兴学记》作为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立教，以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要讲学内容。他讲学的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每论一学，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在讲授孔学、佛学、宋明理学的同时，也讲西方哲学、政治学和中外史学等。康有为讲学是为宣传托古改制，变法维新。他办学四年培植了维新派的一批人才，培养出像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人，后来都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人物。

在万木草堂的教学中，社会学被列入教学内容之一。在我国社会学传入之初，称社会学为“群学”或“人群学”。据梁启超所记长兴学舍（即万木草堂）的教育大纲分为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类，在学科中又分义理、考据、经世、文章四

种，而经世中列有“群学”。长兴学舍教育大纲中学科科目如下：



说明康有为把“群学”即社会学及社会思想列入教学内容。维新运动前后象万木草堂这类学堂，到1897年就有近二十所。在戊戌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鼓励办学之后，全国各地兴起办学热潮，其中除京师大学堂外，影响最大的是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长沙办的时务学堂，严复等在北京办的通艺学堂等。

在湖南顽固势力特别大，新旧斗争也特别激烈，维新派创办学堂，还设有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分别任总教习、教习，有学生40多人。